

跳出男女性别失衡的陷阱

29岁的郑丽霞是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人。今年正月,怀孕4个月的她在亲戚介绍下,辗转来到相邻的潜江市一家乡镇医院。医生帮她做完B超检测后,告诉她胎儿是个女孩。

回家后,郑丽霞又经人介绍找到监利县分盐镇个体医生戴梅香,进行了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手术结束后,郑丽霞大出血不止,被连夜送至县人民医院抢救。公安机关事后查明,原本只是卖药的戴梅香在发现当地许多妇女偷偷流产婴儿后,便开始暗地里从事更加赚钱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在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两回事。后者的严重失衡远未得到根本缓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普查公报发布前两天的4月26日刚刚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主题即是“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

“由于老龄期的妇女寿命高于男性,而我国又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总人口性别比例。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直在120:100左右,目前有所下降,也高达118.06:100,远远高于



【资料图片】

于102~107的正常范围。”翟振武对记者说,如果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得不到缓解,将给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隐患。

冰山一角

记者调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各地普遍存在,在某些县市情况还非常严重。

郑丽霞所在的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局长李继国介绍说,该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6年开始就严重偏高,1998年达到峰值186。近5年来新生儿男女比达到150.66,二孩男女比例达369。据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2009年调查,新洲、黄陂、大冶、阳新等29个县(市、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其中比监利县严重的县、市就有4个。

在四川,2001年~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16左右。全省181个县(市、区)有27个县(市、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最高的达到147。

陕西省在1995年~2008年,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2.96,二孩为142.97,三孩及以上达到173.23。在陕西个别地区,二孩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达到200以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中国等亚洲国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维,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那么一定是有人、有机构在进行不正常的干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

据公安机关介绍,郑丽霞的经历只是众多“两非”案件中的“冰山一角”。长期从事“两非”案件侦破打击的监利县公安局周老嘴派出所指导员李家虎说,在监利县“两非”已形成“地下产业”,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高额的利润让这一犯罪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院的公职人员。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2009年6月~8月,监利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两非”案件94起,其中县内案件82起,其余12起案件发生在监利县周边的县市以及相邻的湖南省。2010年这项专项治理活动又查处了78起,其中县内案件56起,其他案件涉及3个县的

16个县、市。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樊明波因为查处“两非”案件,经常往返于湖北周边各省以及东南沿海各省市,并与当地计生局干部有广泛的交流。据他介绍,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但各地计生部门都不敢将真实的数字上报。“我所接触的一些县(市、区),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都在瞒报真实情况,超过90%的地方都更改过数据”。

樊明波介绍说,有的地方性别比失衡严重,就找其他地方的计生部门“借数据”充数,即在上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上直接作假,或者捏造一些女婴的信息,从而将出生男女的比例拉低。还有的县市计生部门从其他地方拿到一些女孩的姓名信息,将其作为流动人口登记在当地,湖南省某市计生局采取这种办法甚至获得了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单位。

性别透支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依法打击“两非”。与翟振武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告诉记者,《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都有禁止“两非”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只能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刑法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给予定罪,但对医生的同样行为不能进行刑事制裁,对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也没有相应规定。”于学军说。

“两非”猖獗最主要原因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存在漏洞。”樊明波这样认为。监利县第四人民医院B超室主任医师胡水平在2007年~2008年里,在同院医生万凡、孙中保、李志及县二医院护士董琴等人的介绍下,多次为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每次收取200元~400元好处费。2009年,胡水平被开除公职。

据了解,监利县有不少像胡水平这样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参与非法性别鉴定。2009年监利县集中整治“两非”时,就查处了15家公立医院的39名公职医生。此后,“两非”案件的违法主体由公职医生转为个体医生以及非法行医者。

记者从监利县卫生局了解到,对于郑丽霞案件中的个体医生戴梅香,卫生局执法人员曾多次上门检查并作出罚

款处理。监利县卫生局副局长王鸿介绍,郑丽霞案件发生后,他们将戴梅香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王鸿说,对于打击非法行医和无证行医,卫生局的处罚力度很大,仅2010年就查处案件20多起,罚款60多万元。

王鸿表示,这60多万元罚款要上交财政,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卫生局,“我们还希望多破获一些‘两非’案件,不然几十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卫生部门以罚款为主的打击方式,反而助长了‘两非’案件的蔓延。”樊明波告诉记者,有一位个体医生曾经多次被查处,但每次被罚款后没多久,就又开始非法从事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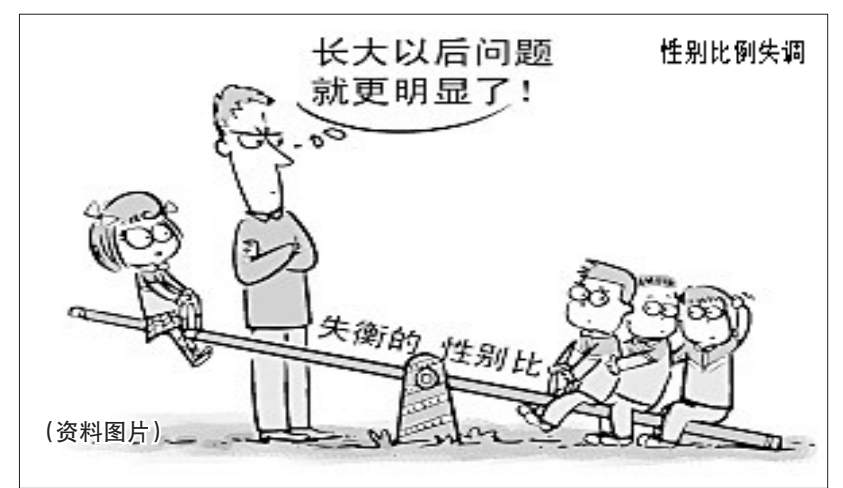
李继国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只要在每台B超仪上安装一颗芯片就可以制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可现在仪器和医生不归计生部门管,没法落实”。

于学军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产生了“两非”执法难、查处难等问题,这使一些不法分子无所畏惧,屡查屡犯。因此,在充分运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则,同时加强综合执法。

樊明波说,由于“两非”大量发生,监利县每年多生近3800个男孩,从1994年到现在共多生了近7万个男孩。而从全国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男光棍”将更加集中于边远贫困地区,这将大大强化这部分群体的弱势地位。这种现象与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目标极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这种失衡,将直接妨碍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导致犯罪率上升、同性恋增多;造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非法婚姻、非婚生育等现象大量发生。“由于农村的失衡比城市更严重,未来的‘男光棍’将更加集中于边远贫困地区,这将大大强化这部分群体的弱势地位。这种现象与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目标极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多位受访专家警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给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资料图片】

利益导向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法律、法规、行政等约束类治理工具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英认为,性别比偏高的背后,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现行生育政策等,仅通过约束类工具难以根治,需尝试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陕西曾是国家重点管理和督导的14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较高状态的省区之一。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相国介绍,近年来该省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作为“柔性”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现已初见成效。

2008年陕西省开始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政策,与出生实名登记制度、新生儿免费接种实名制相结合,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数字的相对准确和真实,实现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二胎生育证管理实行一证管一胎,一证管一年。严格执行照顾安排生育二孩只能给予一次机会的规定。对二胎孕情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孕情突然消失、溺弃女婴等现象发生。

陕西省还实行了立体化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

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自2005年以来,陕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西安市二胎出生性别比从2005年的150以上下降到140以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雪雁认为,陕西的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其他省区及全国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受访专家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要见效仍需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建立稳定及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西安交通大学朱楚珠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是以县区为单位考核,但乡镇和村一级在出生人口数较少情况下应如何考核是个难题。“不少地区都存在‘一考就假’的现象”。

朱楚珠建议,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绩效考核,应与二胎全程管理服务制度、住院免费分娩制度相结合,在乡镇和村一级更多地考核有无计划外出生、人口统计准确率等指标,并将干部提拔任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结合起来。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大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工作需要雄厚稳定的资金支持。杨雪雁建议,应在“关爱女孩行动”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方面建立稳定的、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以财政拨款为主,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专项资金。

据《瞭望》新闻周刊

“败家子工程”的诡异性

与高铁项目立项几乎同时上马的丹东火车站综合楼和一座公铁两用立交桥,总投资数千万元,建成仅仅两年多,就被迫拆除和改建,为高铁让路,巨额投资打了水漂。当地居民将这种做法称为“败家子工程”。(5月25日新民网)

败家子,他的“职业”所在似乎就是败家。“家门”不幸,败家子出得多,才会造成“败家子工程”多。近些年来,“败家子工程”可以说是到处都有,无非多少而已、大小而已。不断出现“败家子工程”,一大主观因素便是规划更改频繁。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复建设、破坏性建设之类的“败家子工程”,在大量消耗民力资源的同时,亦损耗着稀缺的财力资源。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败家子工程”其实就是浪费工程,这类工程往往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像丹东的“败家子工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拆除重建,当初地方作规划时是如何决策的?据知情人士说,事实上,公铁立交桥和综合楼开工前,沈丹客运专线建设计划已立项,但建设方根本不考虑立项计划,照样上马建设,结果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浪费。说他们故意败家,大概不是冤屈。其中的诡异性,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得到其解。

“败家子工程”事关低碳经济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问题。不用说,“败家子工程”其罪第一条就是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差钱是败家子所从属的小利益集团内部的一件事,但浪费社会资源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自然资源经济学的解释中,资源和环境的含义一样,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就像劳动与资本一样。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不是以败家子的方式用来浪费的,因为人类从各种资源的服务中获取了产出或满足。有人做过统计,本土的建筑业在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的同时,也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建筑垃圾数量已占到垃圾总量的30%~40%。短寿命与资源高消耗并存,已成为本土建筑产业的一大痼疾。想想看,人们能从建筑垃圾中获取什么样的产出或满足?它只意味着灾难,而不会是其他。当然,“败家子工程”其罪除了浪费社会资源这一条,还有许多,用罄竹难书形容,也算不上夸张。

“败家子工程”频频,自有其逻辑线索。最重要的是对施政者权力的监督与约束不到位,问责机制过于匮乏或薄弱。还有就是许多“败家子工程”都是和腐败工程搅和在一起的,它们在一般情形下,形成共生关系。这是悖论,也是常见的事实:“败家子工程”本是败家子之事,但是那些败家子们倒是因此而立了家。更为杯具的是,在很多领域很多地方,“败家子工程”出来也就出来了,只见为之推责的人,难见为其负责的人,这就为以后再出“败家子工程”起了很坏的示范效应。可以这么说:只要遏制“败家子工程”的制度设计缺陷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败家子工程”就会如败家子一样,生生不息,源源不绝。 今语

敢于承认

据报道,在今年5月的一次酒席上,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钟胜权直言:瑞金市正科级以上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妇)?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据调查,两年前钟胜权因为虚开土地证明、接受金钱和性混乱被免职。

你看,两年前“虚开土地证明、接受金钱和性混乱”,够疯狂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比咱们的科级干部可牛多了,但一爆出性丑闻,马上被抓入狱,辞职受审,再也不能重拾往日的辉煌。可在咱这儿就没事。

疯狂的钟胜权先被轻飘飘地“免职”,然后再悄悄复出,两年后又成了一条“好汉”。从免职前的镇党委书记到复出后的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再到如今主持全面工作的旅游局副局长,那些错

误对钟胜权的仕途没产生丝毫影响。就这待遇,无论换成谁,也难免张冠李戴。“免职钟郎又掌权”,不

心里在暗称“I服了YOU!”不知道是钟胜权真的神通广大,还是我们太缺干部了,对这样有过恶劣前科的

干部,居然能成为官场不倒翁,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文/刘昌海 图/王成喜



“仕而优则学”是权利绑架学术

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共485人,提名材料将公示一个月。多名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赫然在列。(5月26日《京华时报》)

有关院士制度的沿革,有人这么回忆: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园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从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可以看出,院士这个称号是神圣的,极为讲究学术水准。而且,院士本来是荣誉头衔,并不是什么行政职务。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能赫然在列,是因为,怎么看,都是一些“学而优则仕”,任而优则学”思想在作祟,是权利绑架学术,或曰学术官僚化,权力爬上学术的光环。

一边做着行政管理工作,一边还要做学术带头人,有这种可能吗?神马都是浮云,高深之学问也要成为浮云?应当说,人不是神,不可能长出三头六臂,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和仕不可能兼得。数学家丘成桐曾说,无论你资质有多好,一般来讲,你将做学问的机会放弃以后,再想重新做起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并不是说不可能,也曾有这种情形发生过,但是真正能够达到情形,几乎是绝无仅有,做学问是不能中断的。我遇见过很多朋友,有些甚至是很著名的数学家,他们有些人会讲我现在一方面做行政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做学问,可是事实上,这是没有办法可以达到两者兼顾的情形。

现在,官本位思想几乎渗透了本土社会的每个环节。当官有权有利,当院士有名气有社会成功感满足感,行政工作和做学问在实践中虽不可兼得,但做院士却能够好处与名气双得。因而,一些人对院士头衔趋之若鹜,也就不难理解了。不是部分人理解上有什么偏差,在那些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眼里,院士身份已然成了一种权力资源,已然成为学术领域里一种支配性的力量。而说到底,这种状况的形成,是由权力腐败所引发,又是由学术腐败所带来。 伊文

从“移民热”看“宜居大国”建设

由招商银行等机构新近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投资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裕人群中,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有钱人移民海外,是否会带走大量财富?有多少“知识精英”在流失?面对新一轮的移民热,社会各界有许多担忧、质疑。

移民不是新现象。历史上,从“欧亚丝绸之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移民实现了世界各地人员的相互往来和商品技术的互通有无,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移民欧美人员携技术、资金与管理经验回归不无关系。今天,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自由度和吸引力,一定数量的中国人移居海外,不仅让个人对生活条件、工作机会、投资环境有更多选择,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尽管移民海外者绝对数量猛增,但比照不断成长的富裕人群、庞大的海归群体,移民是“人走企业留”的现实,以及来华外资“外脑”不断增加的趋势,对移民的过度担忧并不成立,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

不过,如果移民在一段时间成为一种热潮,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关注。

移民话题在当下之所以变得有些沉重,是因为这一轮“移民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的某些“不宜居”因素——受访移民们解释的原因集中在这样几方面: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的生活环境与完善的社会保障,希求投资环境更为规范,期待没有因贫富差距导致“仇富心态”的氛围……移民远行所“期”,也是中国当下所“缺”。人们当然有通过合法合理途径选择更好生活质量的权利,只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及富裕人口过多流失,会加重普通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焦虑感。

移民话题在当下之所以变得敏感,还因为人们担心,一些非法致富人群、借移民而“漂白”。虽然各国移民条款都十分严格,但大量事实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上述人群及其亲属移民出境的审查、管理仍有漏洞。

对“移民热”的关注,理应转化为这样的思考和行动: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发展和改革教育理念,让孩子的成长更健康、更快乐;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提高居民财富的“安全感”;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居民的“尊严感”……

只有从“经济大国”迈向“宜居大国”,中国才能留住财富、留下人才、留存自信,向外移民才不会成为一种热潮,带来诸多焦虑。 民秋